

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行動與檔案——一個由下而上的藝術實踐工程

黃舒屏

2015 亞洲藝術雙年展策展人

姚瑞中和失落社會檔案室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從2010年進行至今，考掘調查了台灣數百處的閒置公共設施，這些標榜為公共建設／館所的空間，原先都承載了人們對於生活的需求和期望，其中有許多是因應現代社會結構變遷或產業轉型而建構的新地方，也有一部分透過建構地方建設，賦予了重塑地方認同的願景。然而，許多願景最後在政治利益與政策的種種不當、失策和失效後，成為與真實生存情境及生命經驗毫無關聯的斷裂空間。這些閒置設施在當地變成突兀多餘、格格不入的構造，失去與在地的連結，孤立成一處「非連續性」的幽魂場所。

我在2015年「亞洲藝術雙年展」中展出〈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當時姚瑞中希望能夠以盡可能最大的空間展出一定規模的照片數量，製造一種壯觀的視覺效果。我們以約七十坪的空間展出了三百零八幅攝影作品，包括厚厚的一本本出版物《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第一至四集、五部訪談影片，以及羅秀芝導演拍攝此計畫的紀錄片《廢墟上的一道彩虹》。當時，整個展場以白光燈管照射，佈滿牆面的上百幀照片是為了彰顯這些失落所在的巨大和可觀性，同時也代表一處處空洞瘡疤的真實揭露。蒼白開展在眼前的是滿目瘡痍的台灣地景，本是投射未來的生活願景被停滯在未完成的某刻；這些願景以政治的華麗承諾開始，最終以失敗的實踐告終。白光加上純白的空間裝置，讓整個展示空間呈現一種接近「過曝」的視覺。這裡所謂的「過曝」（over-exposure）並不是說這些影像都過度曝光而呈現模糊狀態，反而是用來意指：藝術家大量曝光這些閒置的公共設施，讓這些在失當政策下過度開發的畸形建設工程，無法遮掩地大量曝露在白（陽）光底下。〈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並不是一個只展示在美術館空間的計

畫，它的核心實踐是在公共空間，透過多人親歷現場的踏查和影像紀錄，將被灰暗遮蔽的現實呈現在陽光下，回歸這個公共議題的現實面，以及公民參與的可能。「過曝」的視覺／行動策略也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讓觀看者感受到影像所曝露的是真實存在且不容忽視的。這些影像的可觀性，不僅源自廢棄館所的驚人數量，還有多人參與踏查記錄與拍攝所累積下來大量曝光的攝影檔案，每一個影像背後對應與揭露的是一個一個隱密不宣的真相。當「過曝」不是趨向模糊狀態，反而呈現出觀者難以忍受的清晰，影像的檔案化就會轉化成一種對抗「社會集體失落／失憶」的「集體行動」。

我認為〈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是一項極具社會能動力的藝術工程，對照的是國家權力與政府體制所主導的公共工程。此計畫裡所調查與記錄的公共設施，多數源自於政府從九〇年代開始的一系列「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這個計畫的初衷及想法是「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為前提和目標，藉著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與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讓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這個社區的意象」，這是以在地文化和居民為核心意識所發展的政策，目的是「整合人、文、地、景、產」的社區發展面向，並從集體行動來處理並共同面對社區的生活議題（參考自維基百科中對於「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介紹）。之後這個理念及其政策推展擴張到中央政府的各部會（包括交通部、體委會、農委會、經濟部、內政部、客委會、環保署、觀光局等），甚至延伸到各縣市政府。過去二十多年來，這些由各級政府機構制定的總體計畫，累積出來的卻是越來越多的廢墟館所，不但沒有實踐原先以社區及居民為本的核心價值，成為地方精神凝聚的場所，重劃土地所開發的館所成為新廢墟，反而破壞了社區地貌，把在地社群的生活地景變得更加破碎。

絕大多數「蚊子館化」的公共設施背後的政治邏輯，牽扯著複雜的地方金權利與勢力，社區意識多半被少數人的利益所綁架，許多「計畫」淪為政治資源或金錢利益的算計，並沒有真的落實原本的目標，包括凝聚社區居民的共識，以及提升居民的社區參與度。公共工程變成為個人牟利的賺錢工具，除了許多不當的金權私利介入，造成蚊子館的另一個成因，還有頻頻失策的國家／地方建設規劃。從〈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所累積的檔案看來，這些由上而下的公共工程，以及所謂國家及各級政府層級所主導的政策及規劃，這二十多年間，種種不當和失策竟然多達五百餘例（此數目尚不包括未被《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出版的案例），這個驚人的累積數字，突顯出大政府的失能與小市民的失落。大政府未能呼應地方與居民的實際生活需求，符合現實的社會結構轉型，無人檢討這個失敗，並且不停地重

複，如同台灣島內一再誕生的新廢墟，人們不斷地失落在這認同斷裂的空洞地方；這種「空殼化」的建設規劃，充滿著值得被深切檢討、由上而下的政治思維，在這樣的政治運作邏輯下，掌權者的權力遠大於整體公民的權益，而忘記了這些地方建設的核心主體是在地生活的居民。這個計畫一針見血地點出這些由上而下所實施的公共政策、計畫、工程是如此背離人民的實際生活，猶如虛幻的空中樓閣。

由姚瑞中帶領的失落社會檔案室（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的學生）一起進行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其具體執行的方式和目標，恰恰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實踐工程。從在地性的實際踏查行動與公民參與開始，計畫成員回到自己家鄉，以調查故鄉在地的地方公共建設為起點，一一進行實地探勘、感受、調查、拍攝影像、問題分析及討論、編寫並建構檔案等，這些親歷現場的看見和踏查的步履，回歸人與空間的情感連結和脈絡，付諸行動去見證實景、了解並反思和自身在地相關的土地運用、公共政策、資本運作、地方政治、社群、居民、公設建物和社區生態之間實際存在的社會脈絡和關係，並提出他們的在地觀察和觀點，回應政府由上而下的政策缺失和空缺之處。

透過一人一例（力）的實踐行動和檔案工程，這些田野調查、攝影紀錄、影像檔案、公共政策的評論和反饋，經由人與人的自我組織、人與在地關係的脈絡化，以及付之檔案化的影像及行動，重新繪製了一個深具意義的地景，再次建構以「人」為中心的在場，也找回失落在國家權力下的公民權利——公民參與的社會空間在此現形，從空中樓閣回歸到生活現實。姚瑞中與失落社會檔案室所展開的藝術行動工程是由下而上的公共參與和實踐，由付諸行動的社群組織（軟體）來取代空洞的社區／園區設施（硬體），從影像的檔案化來抗拒斷裂的記憶和去脈絡化的土地認同，從公民介入的公共政治來抵抗失能政府。〈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並不是由一個個人力量形成的反抗之力，這是與眾多個體的感性生產以及社會文化工程的公共實踐密切相關。許多參與計畫的成員在訪談中提及，自己是如何透過探索這個廢墟空間的計畫，面對自我的孤寂狀態、挖掘內在的自我；抑或，他們開始走出舒適圈，真正看到自己身處的在地現實，發覺台灣這塊土地的真實面貌。更有人因為這個探勘計畫而邀請家人們共同參與和討論，發掘自己從不知道的家族歷史與在地脈絡。甚至發現，原來家人及周遭的在地居民並不是對於蚊子館的存在和成因毫不知情，只是大家常常心裡默想「政府又開始消化預算了」，而地方的耳語也常流傳著失當設施背後的利益操作。言下之意，大眾對於不切實際的「浪費」

是心知肚明的，這種沉默養出許多失語的廢墟。當姚瑞中帶領藝術學院的學生們進行這場從生活開始的實踐行動，許多學生家長也興奮地投入，一起找尋資料、前往蚊子館探勘、主動提供一些相關的地方記憶和歷史線索，甚至利用一些在地經驗和關係，來幫忙學生們的踏查工作。這樣的計畫，不僅是從個人開始啟動的社會調查行動，它也深切地連結了感性脈絡、社群關係、地方記憶和身體經驗，從鄉間的迷路中突圍，跨越禁止進入的圍障，勇闖那個被噤聲且重重封鎖的公共場所，開啟了一個公共參與和社會實踐的可能。

當然，在眾多成員的訪談錄中，並不全然都是正面的回應，也有進入現實的場域後感到迷惘而懷疑的：迷惘著自己的作為是否是對的？是否會造成別人的麻煩，同時也懷疑著自己的行動是否真可以造成改變？也有父母覺得沒有必要去觸及敏感議題或挑戰公權力，甚至，有人對於自己參與這個計畫的創作性角色和主體性感到質疑。這些懷疑和問題，自然也是社會參與和藝術實踐裡被凸顯出來的重要公共議題。不可否認，從個體自覺為本的社會行動，自主性和批判性的懷疑及反思是必要的，他／她必須對於自我所在的位置有所意識，才能更加理解自我在公共論述裡的發聲位置及行動目標。這個部分和一般建設工程裡由上而下聽令行事的作業，是全然不同的方式。可以說，〈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將個體感性的位置編寫入這個由內在失落所開始的社會檔案化脈絡，並向外打開了一個面對內在空洞與論述廢墟現象的公共空間。這個計畫將藝術與行動的本質回歸個人的感知與表述能力，重新賦予每一雙眼睛看見真實的力量，讓「感知」重回到現實之地，以主體無可取代的身體經驗啟發行動。

每一位在地探勘者的田野敘事、返鄉的行動策略、文字書寫、訪談影片的記錄，填補每一所廢墟在地景脈絡上的空白。最後，一篇篇調查實錄、感想抒寫、文字評論和影像檔案彙成了一本本沉重的出版物，如同重新搭建起廢墟的一塊塊厚實的磚。這一本本、一塊塊的厚磚是奠基於現實的反思，凝聚來自台灣各地學子和計畫成員的土地踏查與情感認同，而它所要繼之完成的建設工作是一項抵抗失落、拒絕空白的社會文化工程。這使得整個計畫的核心精神和它所對話的政府公共工程建設形成一個有趣的對照。因為姚瑞中啟動的這個失落社會檔案室的集體行動，考掘的不僅僅是台灣社會弔詭的「廢墟化」地景，還有其背後不被看見的「精神廢墟」。我們長久以來的視而不見，是否也讓廢墟的空洞成為我們內在的一部分？缺少地方情感和文化脈絡所揉造的金磚，建造出一座座如此虛華不實、空有其表的鬼城，而這個從藝術實踐開始堆砌的文化之磚，正在復原被虛華遮蔽的視覺，也從物質性可見的衰敗中，找回地方精神和感性生活不可取代的實質意義。



2016 雪梨雙年展展出一景

我們在這個抽樣踏查計畫裡所看到的每一座蚊子館，工程規模都相當龐大，相對於姚瑞中與失落社會檔案室的實踐工程卻是從小處落實執行，以個人能力所及的方式逐步進行踏查工作。這一個從藝術課程所開始的作業，沒有國家機器和龐大預算的支援，甚至要自掏腰包去執行，這樣懸殊的對比之下，卻更可以顯示出這個踏查計畫匯聚微小個體所組織出的驚人實踐力。從2010年至今，在六年間整理出了近五百餘所的閒置設施案例。透過公開展示、出版發表，以及報章媒體、雜誌、新聞、影音平台等各項公開管道的大量曝光，這個計畫向大眾開展了一個論述公共議題的社會空間。一塊塊沉重的書磚，累積了社會批判的能量，一一寄送到各專屬機關和單位的出版證據，拋向社會輿論的公共議場，引起蚊子館議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一個藝術行動的拋磚效應，迫使整個國家機制和政府閣揆不得不啟動相關政策與工程進行檢討與改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不僅從廢墟之中指出了一個陷落在發展主義邏輯中而集體失落的社會，同時也形成了一種向其政策的謬誤提出檢討的推力。

許多的公共政策和機構總喜歡向人們談述「願景」，因為相信「願景」總激發人們對於未來的想像，並引領這個想像一路前進到未來。然而從蚊子館的現實裡，我們發現這些公共建設的願景是空有藍圖，但喪失了實踐的能力；當視野被眼前的短期利益所阻隔，便失去了社會使命，也沒有可被實現的未來。「願景」的英文是「Vision」，它的意義除了是一種關於「看」的視野和能力，它還有另一種關於「想像、規劃和實踐」的視野和能力。意思是「願景」不僅蘊含著前瞻性與洞察力，它是超越可見的，一種由想像啟動，並能使之實踐成現實的能力。我認為「藝術」的實踐應富有這樣的願景和能力，不僅可以具備看見真實的視野，同時也必須超越可見性，兼具現實與想像的眼光及行動力。當今藝術實踐的社會性，不再只是一種現實社會的被動描繪與再現，而是進一步思考藝術的社會使命，以及藝術如何作為實踐場域及媒介。2015年展出〈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之際，當我問及姚瑞中計畫還在持續進行嗎？他說，本想告一個段落卻停不下來，全台仍有許多蚊子館還在產生，行動不得不持續下去，第五輯會在2016年新政府上任時出版。這個藝術行動仍持續堅守著社會實踐的發聲位置，以每一公斤的重量、四公分的高度（一本《海市蜃樓》的重量和厚度）逐步搭建一個朝向未來願景的文化工程。如果我們不敢想像未來、怯於實踐的行動，那麼，我們的內在將永遠是空蕩的廢墟。